

香港治与乱

2047的政治想象

阎小骏/著



人 民 出 版 社

香港治与乱

2047的政治想象

阎小骏/著



责任编辑：忽晓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香港治与乱：2047 的政治想象 / 阎小骏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6
ISBN 978-7-01-016197-6

I. ①香… II. ①阎… III. ①政治—研究—香港 IV. ①D676.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96820 号

本书由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授权出版，仅限中国大陆地区销售。

香港治与乱

XIANGGANG ZHI YU LUAN

——2047 的政治想象

阎小骏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14

字数：155 千字

ISBN 978-7-01-016197-6 定价：3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第 1 章 香港的迷茫

- 1 / 香港不平静
- 3 / “八一八事件”
- 8 / 前尘后际
- 13 / 回归的与未回归的
- 20 / 破解困局
- 23 / 待解之惑

第 2 章 治乱一念间

- 26 / 实践中的“一国两制”
- 31 / “急冻式”回归

- 40 / “一国两制” 还是
“一国两治”?
- 45 / 中央的治权
- 49 / “一国两制” 面临挑战
- 60 / 治乱一念间

第 3 章 香港人之惑

- 63 / 认同的政治
- 70 / 香港的心结
- 76 / 北方来客
- 82 / 爱恨“自由行”
- 92 / 深圳河的两边

第 4 章 谁掌管香港?

- 95 / “港人治港”
- 104 / 谁来当特首?
- 109 / 正正反反: 建制与泛民
- 114 / “公务员党”?
- 119 / 法律之上

目 录

129 / 与时代共舞

第 5 章 特殊的边陲

134 / 北京，北京

138 / 合作还是自残？

143 / “底线关切”的政治

150 / “泛民”的困境

153 / “二十三条”

第 6 章 未来的香港

162 / 自信年代

167 / 核心问题

173 / 主权的能见度

180 / 香港的位置

188 / 认受性建设

结 语 迈向 2047

190 / 治港“新常态”

193 / “港独”：虚妄与现实

197 / 2047：变与不变

202 / 命运共同体

204 / 后 记

207 / 附录 本书提及的香港重大
事件年表

香港的迷茫

香港不平静

2014 年，香港不平静。8 月 31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颁布“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 2016 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下称“八三一决定”或“人大常委会决定”），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下称“特首”）的普选制度做出规定。人大常委会决定确认，根据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香港可于 2017 年实现特区行政首长的首次全民普选。但决定同时亦就选举制度做出三项重要的宪制性规限，即：第一，参加特首普选的候选人须由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提名，而该委员会的人数、构成和产生办法，均应严格遵循 2012 年特首选举委员会的成例；第二，每名候选人均须获得提名委员会全体委员半数以上的支持；第三，最终有资格名列普选选票的特首候选人人数限制在二

至三名。这三项重要规定被本地媒体称为“连落三闸”。长期寄望于通过特首普选分享特区管治权力的“泛民主派”大失所望，酝酿已久的“占领中环”行动迅即被转入组织和实施阶段。

9月28日下午，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香港示威者在经历了约一周的罢课抗议后，于金钟冲出警察防线，占领了主要行车通道。在警方防线被突破后大约一个多小时内，中环干诺道中全线、金钟夏慼道全线、金钟道东行往湾仔方向的三条行车线、红棉道，以及湾仔轩尼诗道西段及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一带随即被市民迅速占据。占领行动在数日内蔓延至香港和九龙的其他重要商业区，由此开始了香港示威民众对港九核心区域长达七十九天的占领行动。这场占领运动很快被纳入不同的政治话语的对立论述之中——本地的运动参与和支持者称其为“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中央和香港特区政府则斥之为在外国反华势力支持和策划下的一场未遂的、旨在“反中乱港”的“颜色革命”。而论述的双方都不约而同承认的一点是：“占领运动”的最终发生，的确是香港社会自1997年回归中国以来积累多年却未得到重视的各种结构性矛盾的一次总体爆发。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就在2014年之前的差不多十年之间，北京与香港所共同目睹的是，特区管治中的结构性矛盾不断被各方势力人为地推向激化。从2003年国家安全立法失败开始，到2010年的反高铁运动，及2012年的反国民教育运动的勃兴，再加上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日常抗议活动和例行集会，香港这个昔日的亚洲国际都会俨然已经成为悸动不安的社会运动之都。

随着政治动荡而到来的，还有内地和香港两地民众之间矛盾情绪的激化。特别是2003年之后，由“自由行”政策所带来的大量内地旅客突然出现在香港街头，更使得香港社会和民众猝不及防。加之愈演愈烈的两地“水客”走私活动所带来的一些负面社会影响，在政治矛盾的背景下亦被人为放大，形成了一整套所谓“两地矛盾”的极端论述，甚至连神隐半个世纪的“港独”言论，也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包装下悄然浮出水面，再露端倪。

2015年6月18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否决了特区政府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八三一决定”拟制并提交审议的2017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普选方案。香港政治的困局进一步深化，香港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剧增，北京与香港社会的政治互信关系亦处于1997年以来最不明朗的时刻，被新的乌云所笼罩。任何不故意蒙住双眼的人都不会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已然在2015年的夏天抵达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值得思索。

“八一八事件”

香港病了，但这个英国的前殖民地、如今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特区，其肌体内部的病源似乎一时之间也难以断定。就人类认知而言，了解当下的历史往往是最为困难的。由于缺乏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和间隔，一切纷繁复杂的事件初看起来都显得茫无头绪，也难以寻找到合适的逻辑线索给以清晰的解释和说明。如社会学家吕大乐曾评论的那样：

作为历史，它属于当代，跟作者与读者都缺乏一种距离。它的问题倒不在于是否时间尚早，未能盖棺论定，而是很多事物、经验、记忆依旧新鲜，还在人们的脑海里（因此每个人都有他的说法），令人以为自己心中亦有答案，欠缺一种对历史的好奇。^①

香港这个特殊之城的政治困局则比一般当代史的层次来得更为丰富——主权体认的困难、国族认同的歧异、社群心理的扭曲、经济体量的鸿沟、互信基础的缺失、权力关系的异化、外国势力的涉入、未来前景的晦暗，以及内地与香港之间长期以来对彼此形象的“妖魔化”等种种前日之因相互交织，造就了今日香港困局之果。此时，若寻找一个历史最关键的节点，取其断面，或者多少可以给有心人以相当的启示。2011年8月18日在香港大学发生的“八一八事件”，恰正提供了这样一个了解当前香港政治的截面。

2011年适逢香港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百周年大庆对于任何高等学府而言都是一个极有意义的纪念日。香港大学自不例外。但更为重要的是，在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后，作为前港英殖民统治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所拥有由英国纹章院颁赐校徽的百年学府正面临着严重的身份危机。回归之后的港大究竟是香港的？中国的？还是世界的？如何确定港大在新的政治秩序中的位置？而北京又会如何对待这所在全世界主要大学排名中均

^① 吕大乐：《那似曾相识的七十年代》，中华书局（香港）2012年版，第5页。

名列前茅，但却是由异族统治者创建和发展起来的殖民地大学？这些问题的答案将直接决定港大未来的政治地位和发展方向，京港各界都对此拭目以待。

中国政治讲究“格”——规格体现了一个机构或个人在中国政治体系中所享有的待遇和地位。中国政府对于大学的百年校庆有既定的处理规格。为中国培养最精英人才的两所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自然享受特权。被俗称“两校”的北大（1998年）、清华（2011年）百周年校庆，官方活动均包括最高领导人亲临校园致贺、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悉数出席盛大庆典、中央电视台向全国现场直播庆典实况及当晚的专场庆祝文艺晚会，以及国家邮政局发行纪念邮票等殊荣。京外最高级的国立大学获得的规格则略有减杀，但至少包括最高领导人致贺信及一名中央政治局常委出京参加庆祝大会，中国邮政亦间或会为个别京外大学百年校庆发行邮票以资庆贺。

但2011年香港大学的百周年庆典则是一个尚无前例的情形。港大自2011年5月起就开始筹划邀请一名国家高级领导人出席百周年校庆，主要目的之一显然是要明确港大在新的主权体系和国家高等教育版图中的地位。就北京而言，港大尚属一所“体制外”的大学，但因位处中国境内又学术声誉崇高，给予其何种待遇既是对港大地位身份的初步确定，亦是北京作为主权者对于香港上层知识文化界，乃至香港社会的一次重要的政治表达。兹事体大，不可不慎。

北京最后给出的安排是“一国两制”之下的创举。中央政府决定委派

由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率领高级政府代表团亲临港大致贺，并出席港大的百周年庆典。代表团成员包括国家主管教育的最高官员、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以及多位部长级官员。就北京的原意而言，这一精心安排的访问原本是中央政府向香港大学——以至香港的知识界和高等教育界——释放政治善意的方式。第一，在中国政治体系中，派出政治局常委出席京外高校的庆典，就规格而言仅保留给国家的最高级学府。特别是李克强作为明确内定的国务院总理职务继任人，“准总理”到访的意涵在北京看来更是不同寻常。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中，北京给予港大百年校庆的待遇虽不及身为巍巍上庠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却等同甚至略高于其他京外一流的国立高等学府。这一安排就其本意而言，原是为香港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序列中的地位起到“定调”的作用，背后的意义不可谓不深刻。

第二，李克强在港大百周年校庆庆典上正式宣读讲词时专门安排了一段英文演讲，这一做法对于国家级领导人来讲是不常见的。北京试图藉此表达中央政府高度尊重港大作为中国领土上一所世界知名的英文大学的诚意，也是对北京在香港高等教育界切实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一次重申和确认。

第三，李克强在到访港大时宣布，中央政府将设立专项财政资金，每年支持一千名港大学生和教师赴内地学习、考察、开展科研项目。在北京看来，这个计划一方面固然是延续其对港工作中一贯的“送大礼”思路、希望通过为港大提供政策利好来拉近彼此的距离；但更重要的意义恐怕在

于，北京希望透过这一特别项目来表达中央政府接纳和鼓励香港大学以中国顶尖高等学府的身份逐步进入国家高等教育图景的态度。

因此，对于这一场内涵深刻、规格特殊、历史和现实意义重大的政治活动，中央和特区政府都给予了高度重视。在李克强到访前夕，特区政府从行政长官到政务司长再到警务处长都曾亲自到港大检查活动现场。副总理访问当日，港府史无前例地派出大量警力进驻校园协助大学开展安保工作，中央电视台在活动当晚的《新闻联播》节目中，对港大的百周年庆典以及李克强的访问予以重点报导——亦算得上是香港回归后港大在中国官方舞台上的超规格亮相。在官方的台本和政治传播计划里，李克强的来访始终是被北京设计和定调为表达中央政府对香港知识界的善意，并藉此加强同香港高校相互联系的重要活动。

然而，香港社会对北京所试图表达的政治善意，似乎完全没有领情；很快，香港学界和媒体便以中央政府始料不及的方式作出回应。如果说李克强访问校园当天，港大学生李成康等三人与警方和校方就示威方式问题发生的摩擦尚在预料之中的话，那么整个事件在访问结束之后的继续发酵，以及被本港媒体不断放大则超越了北京可以理解的底线。香港媒体就李克强副总理来访的有关安排发出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三点：第一，质疑者认为港大为李克强安排的是校监专用的座椅，矮化了同场出席庆典的香港特首作为港大校监的固有地位。第二，质疑者认为前香港总督卫奕信(David C. Wilson)获邀参加庆典，却被安排于主席台第二排就坐，是矮化了这位前殖民地高级官员、港大前校监的地位。第三，质疑者亦认为在访问

当天，特区政府在校园过分配置了警力，并对试图示威的港大学生李成康等三人进行了不正当的禁錮。

这三项质疑触及特区与中央的关系、香港与前宗主国的关系，以及特区政府与香港公民社会的关系这三个回归后最为敏感的政治议题，立即引起轩然大波。一时间，在媒体和“有心人士”的推波助澜下，整个事件被不断加温，以至于时任港大校长的徐立之教授不得不在典礼当日亲自接受学生的抗议书，并在数日后以站姿参加长达两三个小时、由学生和社会人士组织的校园声讨集会。尽管由校方组织的调查委员会所公布的报告以详尽的事实否定了媒体的相关政治指控^①，心灰意冷的徐立之仍宣布不寻求连任港大校长，并于2014年3月黯然落台，成为“八一八事件”的最大牺牲品。

前尘后际

香港大学百周年校庆，本来是北京向香港知识界和香港社会释放善意的一次重要政治行动，但结果却被扭曲成又一次京港矛盾和冲突的源头。为什么好事居然变成了坏事？“八一八事件”的发生，虽部分属于历史的偶然，但也同1997年后香港政治所具有的极其复杂而又特殊的社会心理

^① 调查报告第8.6段提出，“没有证据表明在香港大学组织庆典过程中（包括座位编排）曾有任何外部力量（包括特首办、中联办或其他任何内地官方部门）向校方施加了不适当的压力。”参见 <http://www.gs.hku.hk/rpanel/Report.pdf>。

背景密切相关。要探究今日香港政治困局的前尘后际，不妨从了解这一奇特的心理图景入手。

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在这块中国领土上生长和生活的不少人仍然对中国主体政治秩序秉持疏离、怀疑乃至敌对的集体态度，并试图将这些情绪和立场以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和同侪教育的方式传递给香港的年轻一代，所憧憬的是在“一国两制”所提供的政治空间下，将香港保留为足以抗拒中国的管治与影响力的避风港，在中国国土上构建出一个政治的“异邦”。抛开某些具有自身特殊利益考虑的政治势力不谈，不可否认的是，对中国内地存在的或多或少的疏离感、恐惧感甚至排斥感，仍然是回归之后香港社会各阶层相当普遍存在的现象。香港社会中弥漫的对中国主体政治秩序及其影响力的怀疑和抗拒情绪，是香港一切政治困局和乱局背后最基础性的社会心理背景，也是“八一八事件”之所以发生的深层原因。

要彻底探究今日香港所面临的政治困局，则须从了解香港社会特殊的集体心理状态出发，梳理以“抗中”“拒中”甚至“反中”为特征的集体心理得以形成和蔓延的诸种肇因。肇因之一，是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后，香港社会的身份认同危机问题始终未能得到解决。香港（及九龙、新界）自十九世纪中叶被清廷陆续割让和租借给英国后，作为居住在英国殖民地上的华人，香港华人社会的身份认同经历了长期的混沌和失序状态。在殖民地制度之下，香港华人既非处于中国政府治下，又非百分之百的英国臣民，其国家认同一直处于真空之中。尽管在文化上，香港社会同中国内地有着密不可分、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殖民地政府和社会上层精英的倡导

下，全社会仍然受到欧风美雨的浸染，长期存在着强烈的仰慕和崇尚西方的集体情结，缺少与西方世界平等交往的经验。同时，二十世纪以来，港英殖民地政府亦有意加强香港社会对中国母体（特别是政治母体）的排斥与疏离感，加上香港同内地之间在过去一个多世纪客观存在的经济落差，使得香港人的身份认同一方面被人为地从中国体系中剥离，另一方面又未能被彻底融入其他政治认同体系（如英国体系）。加之英国殖民者长期宣传的所谓“借来的时间、借来的土地”（borrowed time, borrowed space）之概念，亦令香港华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具有与生俱来的漂泊感，长期未能建立起属于自身的政治认同体系。1997 年香港回归之后，这种由于政治上国家认同的缺失、文化上民族认同的困难以及对自身前途的担忧相互叠加而造成的身份危机就显得格外严重。

肇因之二，是香港内部的社会经济结构性矛盾被投射到“一国两制”的框架，特别是中国内地与香港的关系问题上。从某种程度上说，北京在 1997 年以来充当了香港内部结构性矛盾的真正制造者与受益者的“替罪羊”。香港最主要的结构性矛盾是极少数大商人控制了香港的经济命脉，通过房地产绑架本地中产阶级，并以其庞大的经济势力利诱并俘获了香港的不少地方政治人物。英国和中国政府在过去或明或暗地支持或者认可了香港这一十分畸形的政商经济结构。就港英政府而言，少数本地商人的崛起有利于简化其对华人社会的管控；就中国政府而言，与占据垄断和主导地位少数大商人搞好关系成为保证香港主权转移能够顺利完成的一个政治捷径。无论如何，如果做好极少数本地工商业巨子的工作就可以影响和